

放眼观时变 澄怀作史论

——记美术史论家阎丽川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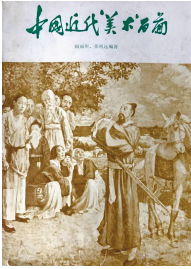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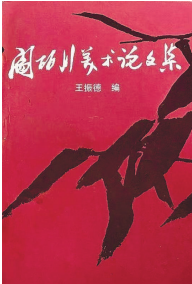
邢莉莉

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阎丽川先生，1910年出生于山西太原，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以及文艺熏陶，18岁那年被保送到太原师范学校，深受美术教师赵延绪的影响。1930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洋绘画。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转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6年到太原中学任美术教师，后十几年间相继在甘肃天水五中、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天府中学、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等校教授美术、书法、工艺美术、音乐、语文等课程。1952年后先后任职于山西艺术学校、山西大学。1954年由山西大学调入天津美术学院的前身——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

阎丽川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美术史论家的代表，是中国美术史学科建立的重要参与者。他的《中国美术史略》一书是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初期的代表性著作，195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依据阎先生此前4年间所使用的讲义底稿而成，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中国美术通史著作之一。当时，全国高校面临着美术史论教材短缺的问题——之前虽已有新式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如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等，但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史研究、考古学、文博等领域取得新成就，需要反映到美术通史中，以满足高校美术专业的教学需求，而上述著作已不能完全满足新的时代需求。

阎丽川先生在《中国美术史略》一书后记中写道：“很早以前出版的若干种美术史专著，由于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也由于几年来艺术文物的发掘，研究工作的突飞猛进，在论点上，在材料上，都受了历史的局限，难以适应当前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下，阎先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正身处新的历史节点，他以勇气、毅力和才学著书立说，既是满足教学之需，更是主动承担历史使命。

《中国美术史略》叙述了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美术史，分十三章，共计十五万四千余字。据不完全统计，书中至少援引专著或文章百余种，在每章结尾处都会列出本章主要参考资料，涉及古籍文献、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报道等，这些资料信息有利于我们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史通史”的写作路径。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美术史略》将马克思主义史观贯穿始终。书中将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



阎丽川先生的主要著作

形态”的划分，结合朝代顺序作为章节框架，并专设“艺术的起源”一节，将马克思主义“艺术起源于劳动”这一经典理论运用于对中国艺术起源的解释中。该书重视从现实与艺术的关系角度分析问题，强调生产力 and 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重视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等等，这些内容都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运用。阎先生力争建立一个阐释框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素对史学方法和史学材料的统领作用。上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学处于最初的探索阶段，阎先生的这部书是当时十分重要的美术通史写作实例。该书既继承了古代画学传统，又纳入了新的考古材料，还广泛吸收新的研究成果。选材得当，立论精审、写作严谨，具有很高水准，很长时间以来被各地美术院校列为教材，并受到社会上广大读者的喜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0年，《中国美术史略》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发行，由原来的十三章改为八章，篇幅却扩充到二十余万字。新旧两版之变是阎先生22年间对中国美术史不间断研究的呈现。为了完成再版，阎先生在古稀之年远赴江苏、浙江、四川、山西、陕西等地调研考察，补充材料。

《中国美术史略》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让人们看到以阎丽川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美术通史者建立起一种新的写作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写一种全新面貌的中国美术史，新中国的美术史学起步于他们手中，他们的著作也塑造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美术史知识结构。

同样出于教学之需，阎丽川和郎绍君两位先生还合著有《中国古代绘画百图》，署名“天津美术学院美术理论教研组”，197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史先后为序，刊载中国古代

绘画史上100幅重要作品的图片，采用左文右图的形式，为每幅图配有说明文字。该书在编写体例上具有创新性，弥补了当时美术史图录书籍稀少的不足。书中的作品选取精准，能够兼顾某一时期的存世状况、艺术水准以及在风格发展或艺术流派中的代表性等多重因素，充分体现了中国美术史发展的节点性变化。作品既包括传世卷轴画，也包括石窟壁画及考古材料，体现了包容开放的美术史观。书中选取的大部分作品仍是今日中国美术史教学中最为核心的作品，可见其选择水准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为作品所配的每则说明文字篇幅虽不长，但严谨精深、分析透彻，尤其在风格分析上能够紧密贴合画法和技法来进行，显示出阎先生兼擅书画实践的优势。该书图文并茂，为便携的32开小开本，在当时条件下虽为黑白印刷，但一册在手，好似良师在侧，循循善诱地逐渐引导读者窥窥中国绘画之堂奥。此后阎先生又在张明远女士的配合下完成《中国近代美术百图》一书，1981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不仅解决了美术院校的教学之需，在社会上也深受欢迎。兹书之后，类似的“百图”类图录著作接连问世，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阎先生著作的影响力。

在对中国美术史进行历时性的梳理研究之外，阎丽川先生还继承“史论不分”的治学传统，对中国艺术进行持续的理论阐释，所论内容包括中国绘画的传统与特征、新时代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书画创作评论，以及先秦诸子美学、唐代乐舞艺术等内容，所论视野宽广，立论客观平实，并且能敏锐感知时代变化，回答时代命题。

在阎丽川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始终贯穿着对中国绘画传统与特征的持续沉思。阎先生曾在1956年12月7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试论国画的基本特征》一文，该文立足于新社会背景，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造

型、构图、色彩、装饰意匠四个方面，并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随类敷彩”等古代绘画核心命题融合纳入上述四个方面之中。1957年又在《美术》杂志第7期上发表《中国画和西画的比较研究》一文，进一步以西方绘画为参照，从“理”和“法”两个方面探究中国画的基本特征。在《美术》1963年第4期上发表《论“野、怪、乱、黑”——兼谈艺术评论问题》一文，从美术史论和艺术批评的角度，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推行之后，“新国画”中出现的“野、怪、乱、黑”式美学表达作出解读，为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化转向以及艺术理论批评奠定了基调。1982年至1988年间，阎先生又先后发表了《中国画抽象吗》《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漫谈传统艺术的民族形式》等文章，这些文章立足于社会变化和时代需求，以西方美术的观念为参照，探究中国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路径问题。这也恰是20世纪中国传统绘画面对的最为重大的核心问题。阎先生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回答角度，他从事书画创作，是时代转变的实践者；立足于史论家的角色，他又冷静理论阐释者；青年时学习西画的出身，又为其提供了他者的视角。多重学识背景和学术身份的叠加，使阎先生对这些关键问题作出了独到而有启发意义的解析和判断。

阎丽川先生还写有不少的美术评论文章，评论的对象有巨匠名家、师长故旧，也有后学才俊、青年翘楚，包括林风眠、钱松岩、张其翼、刘克智、王维卿等人。阎先生的评论本着知人论艺的态度进行，平实率真，在坚实的理论根基和问题意识基础上，对画家作出诚恳的解读，甚至会隐微婉转地指出不足。如评论名家吴地的戏曲人物画时说道：“但也不可否认，这种画无论题材内容或表现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评论刘继卣的人物画时指出：“如果说美中不足，那就是有点‘太像’了。往往使观众如睹实物，一览无余，缺少画外之意。”暂且不论阎先生的这些评论是否契合当下所有观者的认识，因为艺术的鉴赏和评论本就存在差异性和变化性，但这种不虚美、不矫饰，有独立判断的评论态度，在当今尤显可贵和富于启发意义。阎先生还写有一些观展随感，参加美术活动的体会，乃至游历考察的心得，可见他在书斋的静思之外，对鲜活的社会生活也有着细腻的观察和抱朴含真的体悟。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美术史论家的重要一员，阎丽川先生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初期，对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惠泽后学。直至上世纪90年代，阎先生仍笔耕不辍，在50余年的学生生涯中，他始终能与时俱进，发出新论。当我们回溯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脉络时，阎先生所走过的学术历程值得我们反复凝视。

（作者系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学人小传

阎丽川（1910—1997），山西太原人，美术史论家，天津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史学会理事、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美术家协会顾问、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天津市美学学会顾问等职。著作有《中国美术史略》《中国古代绘画百图》《中国近代美术百图》《阎丽川美术论文集》《阎丽川诗词选》。

津沽学人 |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6月11日，中国传统旧书业的“活化石”、古籍版本学家、苏州文学山房第三代传人江澄波先生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100岁。多家媒体发文追忆，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特送挽联：守文学山房，三世续芸，书船长载江南月；为典籍津逮，百年怀朴，冷摊犹存赤子心。

我平时喜欢看书，偶尔也淘几本旧书，与各地师友因书结缘而联系。文学山房旧书店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旧书圈影响很大，店主江澄波是古籍版本学家，从16岁开始参与该店业务，访书、修书、购书、鉴书、卖书、写书，直至终老。通过他的抢救、奔走，很多藏于民间的古书被发掘出来，有的成为图书馆镇馆之宝。



“书船”远行 书香永续

胡春晖

如宋刻大字本《元包经传》，为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宋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宋版《容斋随笔·续笔》，为苏州图书馆镇馆之宝。见到他们“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誉的过云楼藏书归公，入藏南京图书馆。他曾说：“借了‘书’的缘分，我一生认识了不少的藏书家、学问家。我小时候见过章太炎，20世纪40年代见过于右任、陈澄中、钱穆。至于郑振铎、潘景荣、顾颉刚、顾廷龙、李一氓、阿英、黄裳、黄永年等先生，我都曾为他们提供书目、送书寄书，有幸见证他们这些名家藏书、治学的途径。”

书界传闻，国内最有名的三位版本鉴定专著，有“江南三眼”之说，其中“一只眼”即江先生。文学山房是去苏州的爱书人必到的打卡之地。我的很多书友都去过，淘书、合影、签名，生活在苏州的很多书友与江先生联系较多，时常看到他们与江先生交往的信息。基于以上，我平时多留意、关注文学山房及江先生。

武汉文化底蕴深厚的昙华林街区也有一家旧书店，叫老张书舍，店主张福臣也是一辈子与书打交道，编辑书、出版社、销售书，由他编辑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曾引起巨大反响。退休后，张福臣还是离不开书，租下一间80多

平方米的临街店面开了这家旧书店。我有时去喝茶、聊天、淘书，结识了多位爱书人，其中就有武汉作家刘晓航。2019年12月下旬，刘晓航将到苏州参加一个活动，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建议酷爱藏书的他到位于平江路钮家巷的文学山房看一看，淘淘书，见见江先生，并请他帮我购买江先生新出版的《吴门贩书丛谈》。刘晓航果真去了文学山房，与江先生聊天、合影，淘到几本珍贵的旧书，买了《吴门贩书丛谈》一套两本，为我也买了一套。江先生在前页签名钤印，落款“九四老人江澄波”。应我所请，刘晓航在该书衬页题跋：“己亥岁尾往苏州参加老知青齐额的《骑行日记》首发式后，有半日之闲，专程往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苏州段的平江路文化街，寻访位于钮家巷，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文学山房旧书店’，受乡党春晖委托购得‘文学山房’第三代传人，已经94岁高龄的江澄波老著《吴门贩书丛谈》。与波老畅谈许久，购得一批心仪已久的好书。‘文学山房’是苏州著名的旧书店之一，见证了一百多年来江南东吴文化流变史，京沪等地文化名人都曾来此购旧书。”这是我与未曾谋面的江先生的书缘之始。

2020年6月，得知江先生《古刻名抄经眼录（增订本）》出版，我又请苏州书友陈信帮忙购得，江先生在扉页签名钤印，落款“九五老人江澄波”。及至2022年11月，由江先生口述，韦力、张颖整理的《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出版。2023年2月，我再请苏州书友胡伯诚帮忙购得，江先生在扉页后照片页签名钤印，落款“九八老人江澄波”。这是我与缘结一面的江先生的书缘而再，而三。

江先生曾说：“书是我营生所靠，也是我终生所好。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条载书、送书的书船，我离不开书，就像船离不开水。”如今，“船”已远行，但薪火相传，书香永续。6月24日上午，歇业十余天的文学山房重新开张，只是再也见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休两天”的江先生了，进门左边江先生的座椅还在，椅后的书架上新添了一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收藏的老寿星摆件。江先生长子、文学山房第四代传人江延令说，书店会继续开下去，文学山房“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宗旨不变，为全国爱书之人敞开大门，让书香不散。

题图：江澄波先生生前在苏州文学山房旧书店内（王道 摄影）



夏季六节气 居广鸿 治印

林芝平均海拔是3100米，这里山高谷也深。峡谷深到了什么程度？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而帕隆藏布大峡谷则是世界上深度排第三的峡谷。

这里天蓝水清，风景秀丽，被称为西藏江南。喜马拉雅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这两条巨大的山脉，由西向东平行伸展，在东部与横断山脉相遇，形成群山环绕之势，林芝就静卧在这三大山脉的怀抱之中。雅鲁藏布江从林芝朗县进入，在米林县迎面遭遇喜马拉雅山的阻挡，只得折流北上，绕着南迦巴瓦峰做“马蹄形”转弯后，在墨脱县境内向南奔泻而下，最终穿印度而注入印度洋。

来自印度洋的水汽，反其道而行之，在受到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后，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通道，浩浩荡荡一路北上，带给这个区域丰沛的降雨，使之形成特殊的热带湿润和半湿润气候，很好地滋养了这里的植被。因此人们一旦进入林芝便觉满眼翠绿。

来林芝，必去巴结，那里有个巨柏自然保护区，走川藏公路南线会经过，就在路旁，距八一镇仅5公里。这里属高山峡谷地貌，周围高山海拔5000米以上，峡谷海拔3000米，相对高差约2000米。由于潮湿气流逆流而上，降水量丰沛，相对湿度大，尼洋河中下游的北坡、东北坡多分布着针叶、落叶原始森林，南坡多为稀疏、喜暖、喜光、耐旱的疏林灌木林。近千株的柏树就生长在这里。故而这里又被称为“巨柏园”“林芝大柏树景区”。

巨柏是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特有树种，又称称鲁藏布江柏木，属西藏特有树种，极长寿，但分布范围狭小。林芝这里却很集中，不少树龄已达千

林芝平均海拔是3100米，这里山高谷也深。峡谷深到了什么程度？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而帕隆藏布大峡谷则是世界上深度排第三的峡谷。

这里天蓝水清，风景秀丽，被称为西藏江南。喜马拉雅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脉这两条巨大的山脉，由西向东平行伸展，在东部与横断山脉相遇，形成群山环绕之势，林芝就静卧在这三大山脉的怀抱之中。雅鲁藏布江从林芝朗县进入，在米林县迎面遭遇喜马拉雅山的阻挡，只得折流北上，绕着南迦巴瓦峰做“马蹄形”转弯后，在墨脱县境内向南奔泻而下，最终穿印度而注入印度洋。

来自印度洋的水汽，反其道而行之，在受到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后，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通道，浩浩荡荡一路北上，带给这个区域丰沛的降雨，使之形成特殊的热带湿润和半湿润气候，很好地滋养了这里的植被。因此人们一旦进入林芝便觉满眼翠绿。

来林芝，必去巴结，那里有个巨柏自然保护区，走川藏公路南线会经过，就在路旁，距八一镇仅5公里。这里属高山峡谷地貌，周围高山海拔5000米以上，峡谷海拔3000米，相对高差约2000米。由于潮湿气流逆流而上，降水量丰沛，相对湿度大，尼洋河中下游的北坡、东北坡多分布着针叶、落叶原始森林，南坡多为稀疏、喜暖、喜光、耐旱的疏林灌木林。近千株的柏树就生长在这里。故而这里又被称为“巨柏园”“林芝大柏树景区”。

巨柏是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特有树种，又称称鲁藏布江柏木，属西藏特有树种，极长寿，但分布范围狭小。林芝这里却很集中，不少树龄已达千



1937年“七七事变”当月底，天津城内战火熊熊，驻守天津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保安队与日本驻屯军交锋——史称“天津大出击”的这场战斗，在中国抗战史上颇可一记。由于孤军奋战无以支援且仓促上阵战术不利，战斗队伍在7月29日晚不得不撤出，7月30日，天津沦于敌手。然而，这场战斗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对日城市作战中主动出击的重大战役，给日军以重创。

这场战斗是相当惨烈的，天津市政府和南开大学等多处建筑毁于战火，百姓伤亡，流离失所。以此战为创作背景诞生了一部抗日题材小说《冲锋》，作者是张恨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名世。抗战一起，国仇家恨促使张恨水文风大变，他转而成为抗战作家，其创作转向是随着“九一八”事变日寇攻占沈阳开始的。之后张恨水跟随着抗战进程而创作，自始至终关注着抗战，他是写作时间跨度最长，也是作品最多的抗战作家，凡皇皇八百万字之多，计有三十余部长篇与五部中篇，还有若干短篇小说及数千篇涉及抗战内容的散文随笔，令人叹为观止。

张恨水是在重庆写就《冲锋》的。在日寇发动全面侵华后，张恨水毅然毁家纾难，只身从南京来到重庆，加入正拟复刊的《新民报》，并将其主管的副刊命名为《最后关头》，发刊词是一篇题为《这一关》的短文，严峻地表明为抗日呐喊的责任。他撰写发表了大量杂文与诗词，希冀唤醒民众奋起抗敌。此刊被迫关停后，他又开设了专栏《上下古今谈》。我的存书中有些杂文作品，文章短小精悍，针砭时弊，为抗战鼓呼而不停留情面，读来深受教益。

在重庆南温泉桃子沟的“待漏斋”里，张恨水蛰伏八年，在编报和撰写杂文之余也创作了多部小说，如《热血之花》《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多得几乎不可胜数。

张恨水身在重庆，为什么会写一部关于天津抗战的小说？对于抗战小说，张恨水自称“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笔，必定有事实的根据，等于目睹差不多，我才用为题材。因为不如此，书生写战事，会弄成过分的笑话”。他又称这部小说的故事是一个“极关切者”的经历，是那入告诉他天津将沦陷时那一角落的现状。那么，这位“极关切者”是谁？正是他的四弟张牧野。抗战爆发后，张牧野曾随张恨水上山打游击，张恨水遂决定投笔从戎，代表同乡写了一篇呈文，交到国民政府第六部，要求成立一支游击队，并写明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这事当然未成。后张牧野和一批安徽同乡回到老家潜山打游击。为此事张恨水写成一部小说，题为《疯狂》。而这部有关天津抗战的小说《冲锋》，又是以张牧野为原型，讲的是天津沦陷前夕，教员张竞存领导自发组织起来的市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故事。该作品于1938年4月至8月4日连载于重庆《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江西上饶《前线日报》副刊《战地》转载这部小说时，改名为《天津卫》。

《冲锋》和《天津卫》这两个书名，前者所着重的是内容中的“冲杀”一节，后者则是一语双关，天津曾经建卫，故称“天津卫”，而这里的“卫”还作保卫的动词讲，突出其战斗的题材。

张恨水写作向来不甚爱惜文稿，在报刊发表作品，如无人主张出单行本，就扔了不管。这部《天津卫》，他托人从报上抄了一份保存。此后有赖朋友鼓励，他便将此稿拿出来校阅一遍，改名为《巷战之夜》，又觉篇中故事于巷战、于夜，均未能发挥尽致，于是又增加了书一头一尾的内容——第一章和第十四章，并在“七七事变”五周年当日作序出版，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最后成书是在1942年。

1937年7月之末，天津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有多处巷战。那么，张恨水笔下的那一角落，那巷战之夜，发生在天津哪里？是在河北区五马路。因为这里靠近天津北站，北站一带曾是那场战斗的主战场之一，故而才会有小说中的故事。



第五三七二期

上走，可看到有一棵巨柏的树根处有能容纳两人的一个树洞。大自然的神奇可见一斑。

在中国古代，有一些树被封为“王侯将相”。如泰山中天门云步桥之北的“五大夫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棵被封爵的松树，始作俑者乃秦始皇。河南登封市区北嵩阳书院内被汉武帝封为“二将军柏”的老树，树龄至少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柏树，名副其实为“华夏第一柏”。还有陕西富平的一棵柿子树王，传说曾“救”过明代朱元璋，被其封为“凌霜侯”。有趣的是，汉武帝在登封所封的“二将军”，是相较于“大将军”“三将军”而言的。而在北京景山东门内观德殿前的“二将军柏”，却是两株并立的古柏。此二柏苍劲挺拔，枝若龙爪，相传为辽金时期所植，清代康熙帝为其命名。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这种现象。美国就有棵谢尔曼将军树，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红杉国家公园内。这是棵巨杉，论体积堪称地球上最大的树，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有机体。

林芝巴结巨柏自然保护区内的这棵柏树之王，俨然就是一位历史老人，通体泛着冷峻的智慧光亮。历风霜雨雪2500多年，仍默默耸立在这里，与其他巨柏共享一方沃土和一片蔚蓝的天空。树干里该嵌入怎样的一种信念，才能让这棵柏树之王独守如此神奇的生命姿态和绝妙的自然景观？

“千尺飞涛云外捲，祇令今日影犹寒。”日照不足，你把头一再抬高；氧气不足，你把胸一再扩宽；水分不足，你把根一再扎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永远是那颗向上之心。心灵澄净丰盈了时光，我欲与你心灵相通。

冲锋天津卫

杨仲达



《冲锋》后改名为《巷战之夜》出版，此为书影